

# 经济社会体制

# 比较

---

科尔内夫妇谈中国经济改革

---

部分地市领导对深化改革的  
思考和建议

---

沈鉴治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前景

---

林至人：中国面向市场改革  
的一些问题

---

谭 健：外国科技人员流动  
方式的比较

---

一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路  
——泰国正大公司介绍

---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87 5

# 匈牙利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改革

## 访问随笔

〔匈〕科尔内 达尼尔

〔按：本文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和夫人达尼尔1985年的访华观感。原载于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的《经济学文献》第36卷（1986年）。最近作者把这篇观感寄给了本刊主编，现译载如下。〕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我们于1985年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访问。尽管我们已经读过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但我们绝不想自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研究只有一千万人口的祖国匈牙利已经几十年之久，仍感到知之不足。我又怎能仅凭几本书籍、几次谈话和一次为期四周的访问，就奢望对中国这个人口是匈牙利一百倍的大国了解透彻呢？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记录我们的初步印象。

### 构成中国经济图象的诸种因素

构成中国经济图象的大量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1. 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这种政治结构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国民经济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经济调节活动大部分是由中央统一进行。

从这方面说，中国与苏联、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同属一种“体制大家庭”。不错，中国在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曾与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有时这些争论甚至酿成严重的矛盾冲突。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体制大家庭”成员间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这些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本质特征甚至完全相同。因而，他们的经济机制以及经济组织的行为也都十分相似。我们确信，承认这种体制方面特有的同一性或者至少是近似性，乃是了解中国的关键之一。

2.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了**改革的进程**。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谈几句中国改革前的情况。尽管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经济机制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机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相似的。它们都是“传统的”和“古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一般类型的特殊历史表现形式。人们都知道，这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有优势，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一等级调节，上级的指令起决定作用，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中价格信号的作用受到压抑，经常发生短缺等等。

人们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改革”一词。我们希望对下面两种情况加以区别：一是对传统的旧机制或多或少地进行一些修正；一是进行彻底的变革，从而深刻地影响各种社会条

件、财产权和经济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且极大地缩小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从根本上增加市场的作用。我们只把后一种彻底的变革称为“改革”。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改革。继南斯拉夫、匈牙利之后，中国作为第三个国家踏上了改革的历程。分析这场改革是了解中国的又一关键。

3.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实际是委婉地指出，它是一个不发达并且贫困的国家。八十年代，先进工业国家的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0至30倍。<sup>①</sup>中国经济的一些特征并不是由制度的原因产生，而是由特定的环境所造成的，这就尽管它发展很快，但仍然是一个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

4. 最后，构成中国经济图象的一些因素**独具特色**使其区别于其他任何国家。它的这种独特性实际含义很广，内容很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划分。我们在这里想列出下面一些情况：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着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历史上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当然，中国的现状不仅是很久以前的历史造成的，而且也是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造成的。众所周知，后者有许多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这就是毛泽东时期国家经历的一些戏剧性的变化阶段，如“百花齐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此外，还应加上现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形成的今天的政治局面。

某些人类社会学和历史学派认为：只有通过了解一个国家的独特性，才能了解它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寻找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规律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按照这种观点，应当从分析第四类提到的诸种因素出发来考虑中国。而其他人士，特别是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则倾向于把中国视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之一。

我们的观点则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我们说，上面四类因素同样重要。我们甚至不打算权衡它们的轻重（它们的顺序也丝毫不说明何者更重要）。我们认为也不可能判定这四类不同的因素哪一类更能说明中国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愿意承认，在确定本文的主题时，我们是带有一定武断性的。由于我们是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探讨匈牙利改革的原因，或者把范围再扩大一些，是探讨对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进行多大程度的改革。所以，我们在中国首先注意到的是前面两类因素中所涉及的现象。作为旅游者，我们羡慕那些几千年前的雕塑、赞赏古老的京剧艺术；作为富有同情心的人类一员，我们又为那里的大城市的住房条件之差而感到震惊。然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人员，我们最关心的则是：中国与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那些社会主义制度有哪些相同之处。中国的改革与匈牙利的改革有哪些相似之处？这两种改革的区别有多大，为什么？在距我们的国家几千英里之外的一个有着不同历史的文明国度里，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令人吃惊的相似现象。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些相似的现象，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或者至少是那些踏上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我想先谈一下乡村和城市的改革，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情况，然后再短谈缺、通货膨胀以及强制性增长的问题。最后再谈一下中国的某些经济和社会矛盾。

<sup>①</sup> 依照现行价格和汇率衡量，比率是1：30。然而仔细的比较分析则试图将汇率和价格限制或调整到某种程度，它表明这种比例大大低于上面的数字，仅为1：10。见世界银行编《世界的生产与收入》，华盛顿1982年，以及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华盛顿1983年。

## 乡村的改革——农民农场

关于中国的农业改革，许多国家的报纸都做报道，研究文章也有不少。<sup>①</sup>尽管如此，概述一下这场改革的主要特征也不是没有必要的。

改革前的中国，农业集体组织的集体化程度甚至高于苏联的集体农庄这一农业组织形式。“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它既发挥着国家权力机构的作用，又担负着组织经济的工作。任何产品的生产不置于公社管辖之下，都要受到指责。

改革之后，土地在法律上仍归公社所有，但实际上却交到农户手中。农户耕种的不只是一小块“家庭自留地”，而是全部土地（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留给国营农场和集体耕种）。其正式名称是生产责任制。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是，自己是独立经营的那块土地的永久租赁者。租赁期限可以不断延长；今天最普遍的租赁期限为10至15年，有些甚至是30至35年。土地租约可以继承。尽管法律上讲，租借户手中的土地可以被收回，但现在这种变革实际上是把土地分到农户的手中。义务交售产品的做法已被取消。现在产品出售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说来，农民以某种形式交足租金后，剩余的产品就可以自行处置。他们可以按照合同把这些东西卖给统一的收购部门，合作社或私人粮商，也可以自己直接到城市的自由市场去出售。

这一变革，事先并没经过周密的计划。在改革的初期，曾出现过好几种不同的改革方法，有些并不想彻底废除公社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只是在最后，上面提到的这种制度才得以普遍实行。这一改革并不是由“上层”设计的，而是根据广大农民自己的意愿“自下”进行的，农民所希望的正是这种制度。国家的政治和权力机构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是尽一切可能推广这一新制度。

农民不仅在实现这一制度的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他们在农业生产中也表现出同样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可以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改革前的情况。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2—3%，几乎赶不上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食物供应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全世界都以为，这个人民曾经长期忍饥挨饿的大国已经最终战胜了这一严重的困难，人人都可以吃饱饭了。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到当时的悲剧：六十年代初这个国家可怕的饥荒夺去了成几百万人的生命。

实行改革以后，粮食生产直线上升，每年几乎增加8%，大大超过了已减慢的人口增长率。1978至1983年期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日益富裕的象征：一排排新建的楼房、一栋栋农民的平房，以及村庄里其他许多标志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征兆。十年前一位外国参观者肯定要被领去见村里的一位最熟悉毛泽东语录的人。而今天，外国的参观者则要被领去看那些住得最好、家俱最美的农户，或者是那些饲养牲畜最多的农户。

创造农业“奇迹”的唯一秘密是中国农户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即这些年大自然也很慷慨，天气一直不错）。直接可见的物质刺激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虽说这些年进行的投资和取得的技术进步对农业的迅速发展也很重要，但却不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条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干活比以前卖力气，并且也比以

<sup>①</sup> 索林格尔著《中国社会主义的三种类型》一书对此论述得非常精辟。

前认真仔细。结果是，不但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大大增加。可以购买的食物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自由市场上东西很多。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这些变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8亿中国农民赞成和支持社会主义政权，自愿采取“家庭农场”这种形式。这是值得各国注意的事件。那些社会和经济都刚刚开始或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注意这件事。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促使人们重新全面地认识农民政策和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当然，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前景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事情。是否将由几百万小土地所有者来为市场提供产品，而他们中又将产生一批长期或短时雇有几名工人的小资本主义农场，由他们构成农业生产的支柱？这些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今天还是很低的。今后这些家庭农场是否会日趋于资本密集、生产发展是否会依赖于技术装备的改进？大型农场（不管它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作用是否将增强”，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否会实行某种联合？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也带来了大量失业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事件。在改革前的集体经济中，乡村中人口过剩的问题一直被掩盖着。村子里的成年人，一律由公社负责分配工作，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正如中国人自己说的：人人都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家庭农场有强烈的财务利益，加上实行自由买卖，于是剩余劳动力就变得突出了。要实现收支相抵，就必须仔细地进行计算。今天的生产活动远比从前的生产活动更紧张，这势必要剩出一部分待业的劳动力。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是否将保证不断吸收乡村里不断增加的待业人口，这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解决这一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乡村“工业化”。这种情况有些类似匈牙利农业合作社中的附属车间。在中国，乡村集体所有的非农业企业非常之多，他们从事着工业、建筑服务或商业等项活动。生产的投资尽可能少。例如：他们从城里的工厂购买一些旧机器。尽管这些非农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当之低，但他们也的确帮助增加了国民收入，并且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有“双重收入”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来自农业生产，另一部分来自其它的行业。

## 城市和国有工业的改革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领导人，于是他们在城市也推行改革。从人口上说，城市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城市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却明显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城市改革基本内容之一的显然是私人企业的出现。个人商贩和手艺人大量存在，其中有些人技术水平之低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情况。一户人家将一架缝纫机抬到街边，为人现裁现做。鞋匠也把修鞋的工具摊在街头。另一户人家则端出一个火炉，几把水壶，再摆上几张桌椅开一个“饭馆”。更多的人则是在城市工商管理机构的监督下，到自由市场上从事零售或手工艺活动。在商业活动中推小车卖东西的小贩占居着重要的地位。这完全是亚洲集市的普遍情景，个体商贩喧闹地进行着买卖活动。在改革时期，这些经济活动得到充分的允许，广大个体商人和手艺人不仅开始活动而且提供了人民生活需要的东西。

改革国营企业困难要大得多。下面我们想首先讨论一下国营工厂的问题，分析它的一些特征；同时也阐明：其他部门（如建筑业、服务业和商业）的国营企业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1. 权力下放给各地区的工作正在大规模进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国家有80万国营企业在活动是一幅什么情景！即便从地理的角度看，由一个中心指挥这么多个企业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有26个省和3个直辖市，其中有些省份的人口甚至比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苏联除外）还多。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它的一些决策权交到了省政府的手里，或是交到省政府下面的地方政府手里。

这是一项重要而且必要的改革；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这一改革本身决不等于从行政协调转向了市场协调。各省的政府仍可以继续维持旧的指令性机制。不仅如此，地区性分权还带来一些倾向性的问题，这就是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反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地方自治权相并行，出现了地区自给自足的思想。省政府实行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外省“进口产品”竞争的威胁。同时，它也阻止向其他省“出口产品”，担心这样做会造成自己市场上的短缺。

2. 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属于**双重调节**。它的一部分生产活动承接了改革前的机制，是按照指令性计划的要求进行的。指令性生产所需的材料和半成品都是上级行政部门定量保证供给的。这部分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官方制定，不能更改的。企业在完成指令性生产任务后，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自由出售的，并且它也可以同客户自由商定产品的售价，不受任何限制。然而，要生产这部分自由产品，企业就必须从其他企业的自由产出中获得必要的投入。各个企业的指令性生产与自由生产之间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企业的指令性生产只占企业生产的50—80%，而其他一些企业的指令性生产实际上仍占到其现有生产能力的100%。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这种双重调节制的好处和弊端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赞成这种双重调节制的人说，这种做法使得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仍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并且，它也允许逐渐扩大自由经济的范围。反对这种双重调节制的人则指出：旧的指令性机制中一些人所共知的危害仍得以存在：制定计划过程中讨价还价，隐匿资源、向上级机关谎报情况，以便得到尽可能少的指令性生产任务，和尽可能多的生产原料。企业的经理过去只是在完成指令性计划指示的过程中玩弄欺骗手段，现在他们还可以利用指令和自由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谋取好处。从匈牙利的经验看，我们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匈牙利改革证明，中央统一制定指令性计划指示的体制一下子就可废除。**这样做绝不会使经济运行遇到危险，甚至不会阻碍国家权力机构对企业的经济施加重大的（有时是太大甚至不必要的）影响。**正像在改革农业时非常大胆一样，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工业机制的任何方面，特别是改革国有部门的机制时却非常小心谨慎。

3. 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促使国营企业关心自己的利润。与此同时，“**软预算约束**”的现象在这里也十分流行。我们在同中国的经济学家谈话时，他们多次使用这个词；他们是从匈牙利的书籍中学到这个词的。企业的活动没有受到财政资源的严格限制，获利能力不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长期亏损的企业不仅能存在下去，甚至还能扩大。利润的最终量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上级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制定的。对利润的讨价还价还发展成很多种形式。起初，在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签定“**利润承包合同**”——这对利润动机是十足的讽刺。通过一些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上缴多少利润，留下多少利润。后来，当开始实行利改税时，向真正的利润动机迈进了一步。这种做法意味着企业在纳税后留下剩余的利润。然而，作为税收内容之一的所谓“**调节税**”，又再度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提议收缴这种税款的人希望用它来消除那些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

的企业之间的获利差别。可是，谁又能判断出企业经营的好坏表现在哪里，企业的好运或厄运又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克服自己内部的不利条件，这就已经表明它的经营不好了。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们是很熟悉这种问题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过去的经验证明，今天中国的经验似乎也证明，只要试图使公有制企业接受市场调节，马上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努力谋求获得豁免；人们说，是啊，应该存在某种竞争，但它不应当是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真正”竞争。

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们也很熟悉中国的企业经理列举的那些拉平利润的事例。在毛泽东曾经提出绝对平等口号的国家，今天又在坚持利润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国营企业赢利率平等，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上级行政部门通过税收的办法，将他们认为“过多的”净收入从赢利高的企业转到亏损的企业。一位企业经理引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来形容这种情况，叫作“鞭打快牛”。另一位经理讲了下面一则故事，介绍了企业赢利大投资亦相应增加这一原则在中国实施的情况。他讲：“我们假设第一个企业可以用自己节余的资金搞两个投资项目，而第二个企业连进行一项投资的资金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头一个企业的资金有一半被拨给第二个企业，这样两个企业都可以搞一项自己的投资项目。而第一个企业会因工作成绩好而被奖励一面红旗。”

4.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同它的工人的关系方面有一种特有的父爱主义职能。中国企业的这种父爱主义职能得以发展是由好几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无疑是东亚的传统。在日本的私人企业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多少相似的现象。由于旧的经济和政治机制，下达指令性任务的体制、市场的废除以及经济的短缺，这种亚细亚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改革之前，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享有许多公社社员享受不到的优厚待遇。当时在国有企业工作是一种特权。现在，农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与独自耕种土地的农民相比，国有企业的工作是否仍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失业的威胁，并且将来这种威胁还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有企业工作仍将是一种特权。

当然，要在国有企业中找到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可是一旦进去工作，也就不可能再离开了。国有企业的工作可以由家庭成员顶替。企业经理不能解雇工人，工人也不能辞职；经理与工人几乎被拴到了一起。①只有当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市场也已出现的时候，才能谈得上使国民经济均质地结为一体的市场，②而中国恰恰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企业不仅是工人的雇主，而且也兼有一些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职责。例如，企业分发购食品卡或某种食品，或者分配住房。随着市场买卖食品的普及，企业分发食品的作用日趋消失，而分配住房的作用则因居住条件的恶化继续保留。一般的中国居民没有社会保险，公民权不带来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国有企业的工人也是从企业那里享受到这种特殊的好处的。企业担负维护中央的人口政策的责任。它有权决定哪个家庭什么时候生几个小孩。

前面我们只谈了国营经济存在的四类问题。然而这四类问题就足以表明：农村，特别是

① 农村的工人也是受“土地束缚”的。如果他想离开自己家乡到外面去找一个工作，必须得到本地政府的允许。这种约束多得很，如果他想买一张火车票、长途汽车票或者飞机票，他都需得到地方政府的书面批准。

② 塔多斯：《发展有调节的市场的条件》1985年。

农村中的非国有经济，已经远不同于毛泽东时期了；与之相比，城市，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变化则要小得多。匈牙利1968年改革至今已有18年之久，它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比中国要远些。尽管如此，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包括本文的两位作者在内，仍认为匈牙利改革的进程太慢。现在，很难预测今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也很难知道这些企业将变成什么样子，它们将保留哪些原有的机制。

## 短缺、通货膨胀和扩张冲动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短缺经济。严重短缺的不仅有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且有生产者需要的中间产品和投资资源。改革以后，情况不再是到处相同的了，在某些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中，仍是“卖方市场”占统治地位，而在另一些交易中，则已出现“买方市场”。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食品市场供应非常丰富。对于制造业的供给情况则很难估价。许多商品的供应都能充分满足需求，迅速上涨的物价也极大地限制了需求。还有一些东西，如某些耐用消费则供不应求，人们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买到。

还有一种我们熟悉的现象，这就是，短缺和滞存（或者没利用的生产能力）这两者同时交叉存在。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前，成排成排的出租汽车空等在那里。我们开始以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出租汽车短缺现象，在中国已经被消除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出租汽车极度短缺。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一些机关和企业才整日地租用小汽车并让它们长时间地等在办公楼和旅馆前面，希望在领导人或外宾需要用车时，马上就能有车。短缺助长了滞存（在这里是没有利用的出租汽车），从而又造成了进一步的短缺。

在非市场领域，短缺最为明显，消费者也最头痛。首先必须提一下城市住房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今日中国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个问题也将日趋严重。匈牙利也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我们的印象是，在人口过剩的中国城市（其中有几个大都市，人口已达几百万），住房问题的严重性大大甚于匈牙利。

从匈牙利现在的发展水平看，电话线路的短缺是最令人头痛的一种短缺现象。然而在中国，电话网络才刚刚兴建。私人的家里几乎就没有电话，只是有些高级领导人的家中安装了几部“服务线路”。企业、社会机构和政府机关也只有很少的几条电话线。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即便有十分紧要的公务，也极难与另一个城市或省份通上话。

交通运输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一个环节。谁若想乘坐飞机，都必须持有公家的证明信。有一次我们因事需要改变行程，不从上海飞往我们原定要去的的地方，而要飞回北京。然而，我们在几天前就已无法通过“商品的途径”，即民航售票处，来更改我们的行程。我们的陪同只好求助于高级乃至更高级的机构。与此同时，我们也只好继续留在上海的旅馆里，而旅馆也不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最后还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出面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个城市拥有一千三百万居民，比整个匈牙利的人口还多。副市长的职权相当于匈牙利的副总理，肩负如此重任，面临几百万件工作的副市长竟还要亲自解决两位外宾预定客房和购买机票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像这样级别的高级领导是要经常解决这类不重要的问题的，因而我们对此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我们对副市长的这种帮助表示感谢，但同时也为那些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行政和经济工作的人感到遗憾，短缺现象迫使他们从事这种“调度员”

的活动。

显而易见，交通运输的其他部门也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并且今后还将加剧。繁忙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汽车以及各单位的小轿车。如果私人小汽车发展起来（这是生产高度发展必然会带来的结果），那将是什么情景？可以想见在诸如供水和排水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短缺现象和短线问题。

至于说到企业原材料、零件、半成品的供给以及能源供应情况，这里的情况不尽相同。存在短缺还是平衡的市场要看是什么产品、在什么时期以及什么地方。在技术选择方面的停顿、犹豫和强制替代是经常发生的。不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尚不够充分。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消费市场，有些紧张的情况通过公开的**通货膨胀**找到宣泄的出口。官方的报导说通货膨胀率是14—15%，而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字则比这要高。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在争论消费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中国没发生这种争论，因为供不应求无疑存在。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通货膨胀。

购买力的增长几乎是无止境。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国有企业**工资增加**不受限制。旧的行政命令要求冻结工资并为工资基金规定了严格的上限，但现在这些命令已经没有什么效力了。增加工资**再也不**受旧机制的束缚，同时**也不**取决于企业的真正利润动机。企业的经理并不特别害怕增加工资，因为“软预算约束”完全能容忍这一点，并且也可以将增加的工资转嫁给上级财政部门或客户。他们不考虑对成本的影响。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到处都在增加工资。增加工资成了缓解企业内部紧张关系和不满的有效措施。情况常常是，以现金支付的工资伴之以某种额外的实物补助。例如给工人分地毯或照像机，然后将它们打入生产成本。

造成购买力无限增长的另一原因是**投资饥渴**。这种情况近似于匈牙利的投资热，并且与投资问题更为严重的波兰差不多。每个企业、机关、地方机构和部委都想尽可能多地投资。他们知道，最重要的问题是上一个项目；项目一旦上马，建成这个项目的所需钱款就肯定能到手，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不是现在就是将来，问题总会解决。工程项目急匆匆地上马，然后又因资金不足或技术上的困难而拖延下去，这种情况在中国被称为“胡子工程”。

购买力的增加不受限制，这是**强制性扩张冲动**在货币上的反映。了解东欧经济历史的人也都熟悉这一现象。由于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是农业生产的迅速增加），经济决策者们便以为他们的制度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这使他们很不现实地制定增长的高指标。毛泽东时代戏剧性地突然结束以及改革的开始解放了人民中蕴藏的能力，从而猛然间加快了生产增长的步伐。不错，这种加速是前所未有的，举世无双的，但它也决不会再次出现。高增长率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的。如果试图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由过紧的计划造成的、人所共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时期人们曾被强制开展“大跃进”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政策已经放弃了毛主义，可是它却又一次试图搞一场“大跃进”。看来，发动“大跃进”的诱惑力植根于这个制度的最深层，而改革还尚未触及到这个地方。

不仅国民经济的总量指标是个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构**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令人担心的是：片面、扭曲以及不协调这些至今阻碍中国发展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并日益严重。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中国同事掩盖，当我们看到他们制定的实现工农业生产翻两番的伟大国家计划时所感到的担忧。我们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努力谋求某些不仅包括工农业总产值，而且也包括了其他部门的总量指标的增长。现在这个纲领目标狭窄，已经带来了一种危险，

这就是：服务行业以及工农业生产之外的一切基础设施曾长期得不到重视，这下又将被推到更不重要的位置。几千年来中国文化、艺术和建筑的一个根本原则一直都是和谐。然而，究竟什么时候制定发展计划才能考虑到和谐的问题呢？

我们在谈扩张冲动的问题时，还应提一下**对外贸易和国外贷款**的问题。这个国家多少年来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现在它终于也决定在这两个方面实行“开放”了。这样它就有了条件，可以从国际分工中得到那些人所共知的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变革。然而，由于在现有的经济机制中，利润动机还没能刺激企业限制自己的责任，所以便出现了一种几乎没有止境的**进口饥渴**现象。所有的企业、机构、行政部门都想进口。尽快地得到进口货物成了最大的事情，家庭想要进口的消费品，生产单位想要现代化的机器。人们只要多花一些本国货币，买到进口东西是不难的。他们根本不考虑国家从哪儿才能搞到所需要的可兑换的货币。外国的公司，特别是日本的公司急迫地冲向这个似乎广大无边的中国市场。一时间，它们连中国将用什么方式支付这些货物也不考虑。中国的进口现在已经比出口增加了三到四倍。中国的确还拥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但这些储备正在迅速地被消耗掉。外汇储备出现赤字，幅员辽阔的中国成为负债的大国，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现在来谈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承认，相对价格严重扭曲，某些产品和服务价格大大高于价值，而另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则价格过低。工资制度中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扭曲。由于价格和工资体系扭曲，市场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因而急需进行调整。可是，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有人建议采取一种渐进的解决的办法，即进行一系列局部调整。因为他们担心全面改革会造成太大的震动。而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渐进的解决办法，其理由是这样做会加剧价格-工资-成本这种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我们觉得后者的观点更令人信服。因为只要价格或工资稍有一点增加，立刻就会带来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从而造成了其他部门的普遍提价；其他部门的这一做法，反过来又致使增加价格和工资的企业再一次增加价格和工资。接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迫使人们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每个生产者都把成本将来的增加打进产品的价格。应该记住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正是由价格和工资的上涨的无尽系列产生和加剧的。

## 矛盾：开放与继续闭关自守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经济中的各种不平衡的问题，如：短缺现象、通货膨胀、外贸赤字。中国的经济管理人员和经济研究人员都已经认识到这些现象有害和危险的实质，而且他们也正视这些事实，积极广泛地讨论应该如何战胜这些困难。有一种观点虽未被普遍接受，但却广为流行，这就是在经济平衡没有恢复之前，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持这种观点的人建议采取明确划分的顺序：**首先**，实现宏观的平衡，**然后**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革机构，并让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发展。有相当一批外国专家也赞成这种观点。然而，另一些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两步根本就不应该被分开。我们以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必须在实现宏观的平衡和改革制度两方面**同时**采取果断的措施。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把宏观平衡放在优先地位，将会伴随着调节机制的**重新集中化**，行政协调和行政干预增生，市场作用减弱。

在中国，不仅在某些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也存在

着这种不平衡的问题。虽然人们已经不再信奉文化革命宣扬的那些价值观念，可是新的价值观念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进行的谈话以及阅读的各种分析材料都告诉我们，在中国，政治观念淡化的倾向正在大规模地出现。墙上再也没有政治口号。通常人们的争论都是具体而又实际的问题。

亿万人民的消费欲望曾经受到人为的压抑，而今他们的这种欲望已经表露出来。看不惯这种情况的人讥讽地称之为“消费至上”。这很像匈牙利六十年代的情况，当时常有人说“冰箱社会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确中国的妇女们今天非常高兴，她们曾多年被迫只能穿着灰色或绿色的制服，而现在她们能够穿起艳丽的衣裙。小商店和大百货商场里挤满了前来购买电风扇、电冰箱、录音机的顾客。彩电是最紧缺的物资。在我们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反社会主义”的倾向。人们希望达到小康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要求是正当的。至于什么时候以及多大程度上他们进一步接受其他的价值观念，例如为伟大的理想而献身，这是另一个问题，虽然也是重要的和已被证明是正当的。要想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人们也需要亲自获得更多的成功经验，看到一个人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并从事一些活动，确实能影响国家的事业。

本文中已经提到中国改革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开放”。而开放的一个最明显的含义就是面向世界的科学和文化。这个国家曾长期与世隔绝，其领导人曾断然拒绝人类一切伟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果。今天在这个国家中，突然爆发出发自内心的文化饥渴。我们这里只想谈与我们自己这一行有关的情况，在国外学习的几万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到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学习现代经济。各种经济学家的代表团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访问。外国专家被请去举办讲座和参加研讨会。他们想了解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改革的情况，法国计划的情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管理的情况，以及美国和联邦德国银行的作用。当然，他们贪婪吞下的新的知识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吸收知识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中国的几代人都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老一代人的知识已经陈旧过时，那些被关在监狱里或送到农村养猪的人当时根本没有机会阅读最新的专业文献。成批的年轻人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看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现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开放”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很奇异的结合，封闭与开放、维持改革前的状态与变革结合在一起。从长远的观点看，那些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中国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是无法预测的。不仅我们这些不太了解中国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最好专家作出任何预言也要冒一定的风险。迄今为止，中国的历史上尽是一些急转弯。“开放”与“闭关自守”，“百花齐放”与无情的暴力，“大跃进”与谨慎的减速一直在交替进行。因而不能排除今后改革停步不前或者走回头路的可能。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今天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可感知的迹象。这里我们还可以再同匈牙利做个比较。在匈牙利，人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许多人痛苦、怀疑和感到悲观失望。时停时进的改革进程几乎不具有打动人心，使人精神振奋的力量。而今天的中国则正沉浸在改革初期的欢快情绪之中。一个僵化的社会开始有了生机，消费突然间大量增加，生活总的说来愉快多了。所有这一切几乎使得社会的每个集团都有了希望和信心。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的希望和能够实现。

(刘丽明译)